

●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学术之府也。

● 梅贻琦与清华大学

● 南怀瑾与复旦大学

● 熊秉真与清华大学

● 傅斯年与中央研究院

● 钱穆与香港大学

● 中国大学教育在百年

● 成仿吾与北平师范大学

● 只有办好师范教育，才能办好普通教育

● 李公朴与教育科学的提高

● 从大学意义上讲，师范教育是梦，因为人的教育

● 蔡元培与上海交通大学

● 教育与人才相去里，非此不足以救国

● 马相伯与复旦大学

● 大学要有宏大的气象，而后可以成就大才

● 大学要有宏大的气象，而后可以成就大才

● 大学要有宏大的气象，而后可以成就大才

● 大学要有宏大的气象，而后可以成就大才

● 大学要有宏大的气象，而后可以成就大才

● 大学要有宏大的气象，而后可以成就大才

● 大学要有宏大的气象，而后可以成就大才

● 大学要有宏大的气象，而后可以成就大才

● 大学要有宏大的气象，而后可以成就大才

● 大学要有宏大的气象，而后可以成就大才

● 大学要有宏大的气象，而后可以成就大才

● 大学要有宏大的气象，而后可以成就大才

● 大学要有宏大的气象，而后可以成就大才

● 大学要有宏大的气象，而后可以成就大才

● 大学要有宏大的气象，而后可以成就大才

● 大学要有宏大的气象，而后可以成就大才

● 大学要有宏大的气象，而后可以成就大才

名人与名校

MINREN YU MINGXIAO

王国祥 主编



名人与名校

——中国近现代教育史话

傅增湘 著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王国祥 主编

名人与名校

中石题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人与名校 / 王国祥主编.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9

ISBN 7-5633-4014-9

I. 名… II. 王… III. ①教育家—生平事迹—中国②高等学校—校史—中国 IV. ①K825.46 ②G649.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471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cn>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850 mm × 1 168 mm 1/32

印张: 7 字数: 128 千字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2 500 定价: 13.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一百多年的中国高等教育历史充分显示：名校和名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为高等教育做出卓越贡献的著名教育家们，其教育思想和创造性思维体现于他们曾经耕耘过的高等学园中。由此我便想到，如果有人写出百年来我国的名人与名校，仔细剖析二者间的血肉联系，从一个新的角度（一个侧面）去写我国高等教育史（不受“史”体例的局限），一定会引起教育界同人的极大兴趣。

当人们正在这样热切盼望的时候，王国祥主编了这组关于名人与名校的专题文章。这些文章的题目使人有亲切感，如《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盛宣怀与上海交通大学》、《郭沫若与中国科技大学》，等等。这些名人大都是学者兼教育家，有些则是社会活动家兼教育家，然而文章的主题要求写出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其他可以略而不论，或者一笔带过。在提炼他们的教育思想时，不能只是进行理论性阐述，而必须与他们所在高校的学科建设、学术成就和人才培养诸方面结合起来，使读者能获得具体形象的感知。要做到以上两点是很不容易的。然而，我读收在《名人与名校》一书中的13篇文章，获得的印象是：“人”与“校”相融为一个整体，既见人又见校；体现了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统一，是高等教育个性与共性的结合。我觉得这些就是该书的价值所在。在文字表述上，没有任何泛论和口号，将人与校的关系娓娓道来，如叙家常，这肯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我还想特别强调一下，《名人与名校》一书中，不仅“名校”有个性，有自身的学术风格，而且“名人”也都是有独特个性的人。他们的

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并非“千人一面”，而是充满个性化。我读了这部书稿，获益最多的一点就是名人与名校的个性化。所谓“个性化”，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特点、特色——这些才是创新的结晶。如果高校“千校一面”，那有什么创新性可言呢？当然，“名校”的特色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而是在岁月沧桑的历程中由教育家们、教职工们和莘莘学子共同创造的。教育家中最有创造性的人物就是该书所说的“名人”。

该书所收 13 篇文章中记述的“名人”都已离我们而去，但是他们给高校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并不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光彩；后人会在他们创造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和创新。举例来看，本书中收有《陈嘉庚与厦门大学》一文，作者满怀深情地来写这篇文章，我们跟着他的笔走进优美的厦门大学校园，我们感受到这里的一草一木以及厦大的学科特色等都凝聚着陈嘉庚先生的心血，现有的成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的拓展。《竺可桢与浙江大学》一文，读了以后，我们仿佛看到竺可桢先生今天仍然在浙大校园漫步，他为今天浙大的发展而感到无比欣慰……是的，精神财富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带有一定的永恒性，它给人以巨大的精神动力，激发人们去创新去开拓。如果一所著名的高校没有类似于此的永恒性，没有一种精神力量，那么，她的“名”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国高等学校应当注意自身特色的形成和再创造，注意培养自己的个性并使个性得到发展。众所周知，共性存在于个性中。如果没有个性，也就失去了共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名人与名校》一书的一名读者，我觉得该书有助于唤醒并加强人们的个性教育意识，这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在 21 世纪，这种意识将成为教育界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在这个时候，该书的出版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

张岂之
于清华大学

目录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1

网罗百家	教授治校	教育平民	招收女生	倡导“四育”
革新史学	贯通文理	融合中西	支持研究	扶植社团
建学生军	创道德会			

梅贻琦与清华大学 /17

完善工程教育	引导留学观念	延揽中外大师	注重发展“五育”
--------	--------	--------	----------

陈垣与北京师范大学 /35

融入辅仁,长任校长	慧眼觅才,扶植启功	宽容砺志,爱国拒日
普及文史,为师垂范		

吴玉章与中国人民大学 /55

革命育人,与时俱进	筹建人大,不负重托	以严治校,以严执教
发展函授,普及教育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 /73

借鉴欧美,服务中国 强调应用,开发能力 折毁烟枪,以身作则
大兴体育,砺炼品质

张学良与东北大学 /89

巨资办学,礼聘名士 完善教育,体育为先 严明学制,塑造人格
保家救亡,时代先驱

成仿吾与东北师范大学 /103

兴起听课之风 自我培养师资 实践革命教育 完善师范教育

盛宣怀与上海交通大学 /121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大办工厂,学以致用 严肃学风,严明校纪
配套办学,择优留洋

马相伯与复旦大学 /139

倾尽家产,创办震旦 诀离教会,再起复旦 首开军训,自授博士
大兴演讲,唤民救国

竺可桢与浙江大学 /157

呼唤自由求是 创建导师制度 健全学术机构 流转不废教学

李达与武汉大学 /173

办千人夜校 同主席争论 引各方名师 建哲学名系

郭沫若与中国科技大学

/185

鼓励全面发展

院校所系结合

面向尖端科技

探索超常教育

陈嘉庚与厦门大学

/199

苦心经营,南方之强

面向海洋,注重实用

变卖大厦,维持厦大

倾力以赴,终生奉献



蔡元培

与
北京
大学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
众家之学府也。

蔡元培(1868—1940)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他一生重视教育,尤其重视大学教育。他在20世纪初主持北京大学,鼎力革新,为这所著名学府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他一生事业中的一个辉煌时期。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在今天也仍是有借鉴意义的。

一 入主北大, 锐意改革

辛亥革命后,清末建立的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并曾进行过一些初步的改革。但由于官僚积习很深,改革极不彻底,校政仍相当腐败。不少人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教员中也有不少是不学无术的,课堂讲授陈陈相因,敷衍塞责。这时的北大缺乏学术研究的空气,封建复古主义的陈腐思想泛滥。

1916年9月,蔡元培在国外接到当时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范源廉的电报,促其归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回到上海后,不少友人劝他不要进北大这个是非之地,认为弄不好反会坏了自己的名声。但他也得到另外一些友人的赞同,特别是得到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对蔡元培十分了解和信任,认为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有利于向北方传播革命思想。蔡元培同意出任北大校长,也出于他的教育救国思想。他抱定了整顿和改革的决心,于1917年1月4日就任北大校长。就

职后,他多次到欧美各国留学、考察,着重研究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受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影响,在政治制度上,他赞成议会制和内阁制,反对专制独裁;在学校体制上,他反对校长权力过分集中,成为国内最早提倡教授治校的人。他到校后锐意改革,首先就按照教授治校和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原则,革新了学校的领导体制。

1917年,蔡元培在北大主持设立了评议会,作为学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校长和各科学长为当然评议员,并按文、理、法、工各科的本科和预科分别推举两名教授为评议员。1919年后,改为每五名教授选一人的办法,一年改选一次。评议会制定和审核学校的各种章程、条令,拥有很大的权力,凡大学立法均须经评议会通过。评议会有权决定学科的废立,有权审核教师的学衔和学生的成绩,负责提出学校的预决算费用。评议会主要由教授组成,实际上是一个教授会,是教授治校的重要体现。评议会民主讨论的气氛十分热烈。李书华教授后来回忆这一时期评议会工作情景时说:“我曾被选作评议员,目睹开会时对于各种议案的争辩,有时极为激烈。”由于受蔡元培革命民主主义立场的影响,新派人物在评议会中占有相当数量,因此这一时期北大评议会在政治上曾起过进步作用。它曾多次发表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宣言,支持过学生的爱国运动,并曾几次宣布和北京政府教育部脱离关系。

1917年12月,蔡元培还根据评议会通过的教授会组织法,分别按学科门类主持成立了教授会。教授会负责规划本系的教学工作,如课程的设置、教科书的选定、教授法的改进、学生选科的指导和学生成绩的考核等。

蔡元培对校政改革的设想,是按学校的行政、教务和事务分别设立各种相关的委员会,由有关教授分别领导,统一管理。他要求做到

“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开始他采取加强各科学长职责的办法,由学长分别负责领导各科的行政和教务。五四运动后,除原有评议会司立法外,还建立行政会议及各行政委员会司行政;设教务处、各学系教授会、预科委员会和研究所等司教务;设总务处司事务。这就基本上确立和健全了教授治校的领导体制。蔡元培在工作中作风民主,凡事都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对各方面的人员一经任定,就信任他们,把全部工作交给他们负责,不多去干涉,所以能人尽其才,使学人们充分施展自己的本领。这种教授治校的原则,在当时封建军阀统治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是尤其具有进步意义的,对学校的建设也起了积极的作用。顾孟余对这种领导方法曾称赞道:“先生长北大数年,以政治环境关系,在校之时少,而离校之时多。离校之时,校务不但不陷停顿,且能依计划以进行者,则以先生已树立评议会及各种委员会等之制度,决定政策,以分工方法,处理各种兴革事宜。然而非校长之清公雅量,则此制度不克成立;非师生绝对依赖校长,此制度不易进行也。”

在健全学校领导体制的同时,蔡元培还对北大学科的设置进行了改革。他从大学研究高深学问的宗旨出发,十分推崇理论科学的独特作用,因而致力于把北大办成文理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成为研究学理的中心。北大原先是文、理、法、商、工五科并立,没有重点。蔡元培大力扩充文、理两科,文科原来仅有国文、哲学、英国文学三门,他陆续增设了中国史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和俄国文学;理科则除原有的数学、物理、化学三门外,1917年增设了地质学科。废止商、工两科。法科原计划与法专合并组成法科大学,后因法科方面反对没有实现。蔡元培还主张要融通文、理两科,使一科学生能兼习另一科中的某些门;认为划清学科门类的办法,易造成文理两科之间的界限,也往往出现习文者轻理、学理者轻文的倾向。1919年起,北大

采取了分系制，废去文、理、法科的名称，改门为系。全校共设 14 个系。经过改革，北大成了一所以文、理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

蔡元培投身教育事业后，就积极倡言平民教育，主张让更多的人有受教育的机会。他反对那种把大学看做“只有大学生同教员可以进去，旁人都不能进去”的观念和做法。他对北大原来的招生制度进行了改革，坚持以考生学业成绩的优劣作为录取学生的标准，而不看资格和出身，这使那些出身贫寒、学业优秀的有为青年有机会进入北大学习。同时，他还主张学校的学术活动和课堂的教学活动都可以向社会公开，学校要招收一定数量的旁听生、选科生，使更多的人能受到高等教育。由于这一制度的实行，京津以至远近省份的知识青年来北大听讲学习的很多，他们利用北大的课堂、图书馆，刻苦攻读，并且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除了正式办了手续的旁听生外，还有一些是没有办手续的。他们当中有中小学教师、政府公务员、报社编辑和失业失学青年。他们或是慕名而来听某教授的课，或是长期和本科生一起听讲。这些旁听生中后来有不少人成为革命者或在学术上有造诣的人。此外，在蔡元培的积极倡导和赞助下，北大还在 1918 年 4 月开办了校役夜班，全校 230 多名工友也得到业余读书的机会。一些学生也创办了平民夜校，开展平民教育。

1920 年春，蔡元培在北大开始招收女生入学，开创了我国国立大学教育中男女同校之先河。大学实行男女同校是对旧礼教的一次大冲击，它势必引起封建卫道者的恐惧和仇恨。教育部曾发公函对北大指责，大总统徐世昌也为此对北大进行所谓“告诫”。这时控制北京政府的直奉两系军阀，对蔡元培极为不满，男女同校问题也竟然成为他们对他进行迫害的一个口实。但是，男女同校一经北大首倡，迅速形成潮流，全国各地学校纷起仿效。这是任何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了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蔡元培在北大实

行男女同校的革新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二 不拘一格， 广延人才

广延博学、热心的教员，是蔡元培革新北大、营造良好学术风气的一项重要措施。他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主张大学包容不同学派，广收各种人才并发挥其所长。因而在教员选择上，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这个方针是和他所遵循的思想自由原则分不开的。他反对宗派习气、门户之见，主张“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到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他说：“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他还认为，不同学派的并存，各种学术观点的自由讨论，使学生能够较广泛地接触教员中不同学派的观点，不囿于一己之见、一家之说，“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样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使他们有可能从不同学派的比较中引出新义，提出自己的创见。同时，采取这一方针，也反映了蔡元培珍惜人才、知人善任的民主作风。他深知“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是蔡元培知人善任的高明之处。

蔡元培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不拘一格广泛延揽人才；同时，他对教员的选择，又坚持了很高的标准。他要求：“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

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它。”他还组织了一个聘任委员会,协助校长聘任教员。委员以教授为限。凡新聘或续聘教授都要经过委员会的审查与投票决定。审核是严格的。由于重视延聘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各方面人才,北大的教员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文科文面,集中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同时也有旧学功底深厚的黄侃、刘师培、黄节、陈介石、陈汉章等人。此外,文科的马叙伦、陈垣、马裕藻、朱希祖、崔适,法科的马寅初、陶孟和、周览、陈启修等人也都是国内闻名的专家学者。理科方面,知名教授如李四光、夏元璠、颜任光、何杰、俞同奎、翁文灏、钟观光、李书华,外籍教授葛利普等。这一时期的北京大学,实可谓人才荟萃,学术空气浓厚,盛极一时。

对于那些学术水平低下,不适合在大学任教的,不论中外教员,蔡元培都一律按聘约合同予以解聘。一个被辞退的英国教员,竟要英国公使找蔡元培谈判,要求续聘,蔡元培拒绝了。一个被辞退的法国教员竟向法庭提出控告,因有聘约为据,对方的无理要求没能得逞。蔡元培为了祖国的教育事业,敢于顶住压力,表现了他革新的决心和勇气,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气概。

蔡元培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允许和鼓励不同学派发展方针的基本倾向,是为了打破当时严重存在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桎梏,为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发展争得地盘。他在北大是从整顿文科入手的,极力延聘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来主持、充实文科。他到校后的第十天,即1917年1月13日,就聘请因编辑《新青年》而为青年所推崇的陈独秀主持文科。这时陈独秀才36岁,他和蔡元培一道,推动了北大文科的改革。《新青年》原是由陈独秀一个人负责编辑的,编辑部随他迁京后于1918年1月改组扩大。经由蔡元培先后引进或延